

制度缺陷、非对称依赖与黎巴嫩 经济危机的生成*

李海鹏**

内容提要 2019年黎巴嫩经济危机是一场综合性的债务、金融、经济危机，黎战后畸形的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危机的特殊表现形式。该模式的历史制度根源可追溯至黎内战终止和战后重建进程中达成的制度安排和利益交易，其根本制度缺陷植根于黎巴嫩与海湾国家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和脆弱性。类似的经济、发展和制度问题在黎战后长期存在，但外部政治协调以及海湾资本的持续流入保证了黎巴嫩经济系统得以艰难维系。2011年以来地区安全、经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加剧了黎经济系统的运行负担，导致海湾资本输入政治化，黎巴嫩经济模式诸多固有问题迅速暴露。2016年以来中东地缘政治博弈的加剧，导致黎经济模式倚赖的两大支柱彻底崩塌，黎不可避免地滑向经济危机。

关键词 黎巴嫩 经济危机 战后重建 非对称相互依赖 海湾国家

2019年10月爆发并持续至今的黎巴嫩经济危机，不仅是该国独立后所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更是被世界银行界定为19世纪中叶以来全球范围内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2019~2021年，黎巴嫩GDP由约520亿美元暴跌至218亿美元，收缩幅度在全球193个国家中居首位；2021年平均通货膨胀率达145%，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委内瑞拉和苏丹；2021年公共债务占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东现代民族和国家构建的多维比较研究（多卷本）”（20&ZD240）的阶段性成果。

** 李海鹏，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助理教授。

GDP 比重高达 183%，是全球第四高的国家。^① 如何理解黎经济危机的发生、根源和特点，也成为国内外学界和政策界热议的话题。

西方学者和机构关于当前黎巴嫩经济危机的研究大体可分为四类视角：第一类可概括为国际或地缘政治视角，强调地区政治动荡特别是叙利亚战争和难民因素对黎经济危机的影响；^② 第二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强调油价下跌、沙特针对性经济政策对黎经济的重要影响；^③ 第三类是国内政治制度视角，黎教派分权政体、政治进程瘫痪、真主党“窃取”主权等因素对黎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④ 第四类可概括为发展经济学视角，强调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财政货币政策、融资渠道、人力资本）、制度供给（基础设施、治理机构、营商环境）对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阻遏。^⑤ 前两类研究主要解释黎经济危机爆发的时机，但对于危机特殊的表现形式（财政赤字、外债高企、公共部门低效腐败）解释力不足，特别是相关表现在 2011 年前就已长期存在。后两类研究至少部分地解释了危机的表现及其发生机制，但却难于解释危机爆发的时间点。整体而言，上述研究都未能很好地说明相关争议性经济政策和制度设计的历史根源。目前，国内虽少有针对性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但不少学者已从海湾资本输入、^⑥ 教派分权政体、^⑦ 地缘

-
- ① World Bank, “Lebanon Economic Monitor: Lebanon Sinking (To the Top 3),” Spring 2021, pp. 19 – 21, 29 – 30; World Bank, “Lebanon Economic Monitor: The Great Denial,” Winter 2021, pp. 15 – 16.
- ② Annette Kyobe and Najla Nakhle, “Constraints to Growth in Lebanon,” Lebanon Selected Issues, IMF Country Report No. 12/40, February, 2012; Eric Le Borgne and Thomas J. Jacobs, *Lebanon: Promoting Poverty Reduction and Shared Prosperity*,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Group, 2016.
- ③ World Bank, “Lebanon Economic Monitor: A Geo-Economy of Risks and Reward,” Spring 2016; Hannes Baumann, *Citizen Hariri: Lebanon’s Neoliberal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④ Eric Le Borgne and Thomas J. Jacobs, *Lebanon: Promoting Poverty Reduction and Shared Prosperity*,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Group, 2016; Toufic Gaspard, “Lebanon: Anatomy of a Currency Crisis”, *Middle East Transparent*, 23 November, 2019; World Bank, “Lebanon Economic Monitor: De-Risking Lebanon,” Fall 2018.
- ⑤ Jean-Claude Berthélemy, Sébastien Dessus, Charbel Nahas, “Exploring Lebanon’s Growth Prospects,” The World Bank, August 2007; Annette Kyobe and Najla Nakhle, “Constraints to Growth in Lebanon”, Lebanon Selected Issues, IMF Country Report No. 12/40, February, 2012; Eric Le Borgne and Thomas J. Jacobs, *Lebanon: Promoting Poverty Reduction and Shared Prosperity*,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Group, 2016; Toufic Gaspard, *Financial Crisis in Lebanon*, Beirut: Maison du Futur and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2017.
- ⑥ 陆叶：《金融危机中的黎巴嫩与迪拜》，《国际商务财会》2012 年第 9 期。
- ⑦ 龚正：《“垃圾危机”折射的黎巴嫩之困》，《世界知识》2015 年第 22 期。

政治尤其是沙特因素、^① 产业结构、^② 叙利亚战争和难民危机^③等角度论述黎当前经济危机的相关影响因素。

上述研究的另一共性是，它们都忽视了黎巴嫩作为一个后冲突国家的特殊经济起点和发展轨迹。本文在对黎经济危机的考察中，将尝试引入战争终止、战后制度重建和非对称相互依赖的视角。任何后冲突国家都必然经历安全、效率和合法性的重建，其结果可能不仅仅是该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重塑，甚至国内外利益攸关方互动的地区机制重新洗牌。^④ 相互依赖具有敏感性、脆弱性两个向度；在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中，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将相互依赖特别是脆弱性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权力来源。^⑤ 基于此，本文将从战争终止和重建进程埋伏下的制度弊端、对外部的非对称依赖两个角度出发，追溯黎巴嫩战后经济增长模式和非对称性对外经济依赖的历史制度根源，分析这一脆弱增长模式得以长期维系的原因，进而揭示 2011 年中东变局后推动该秩序走向崩溃并最终爆发为全面经济危机的内外因素和微观进程。通过黎巴嫩的案例，本文旨在探索战争终止和战后重建中的制度安排对中东后冲突国家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持久制度性影响，反思石油美元在海湾国家地区外交中的作用和未来走向。

一 黎巴嫩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内战遗产与非对称依赖

在经历长达 15 年的漫长内战之后，黎巴嫩精英于 1990 ~ 1997 年逐步确立了国外资本输入和国内分配型政府“双重钳制”下的自由放任经济模式。

-
- ① 龚正：《“拼盘国家”黎巴嫩终于选出总统之后》，《世界知识》2016 年第 23 期；龚正：《黎巴嫩总理“辞职”留下的问号》，《世界知识》2017 年第 23 期。
 - ② 龚正：《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国际研究参考》2017 年第 8 期；余国庆、陈瑶：《内部脆弱与外部冲击下的黎巴嫩毒品问题》，《西亚非洲》2020 年第 5 期。
 - ③ 喻珍：《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问题治理》，《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年第 6 期；余国庆、陈瑶：《内部脆弱与外部冲击下的黎巴嫩毒品问题》，《西亚非洲》2020 年第 5 期。
 - ④ [美] 德里克·W. 布林克霍夫编著《冲突后社会的治理：重建脆弱国家》，赵俊、霍龙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第 6 ~ 10 页。
 - ⑤ [美] 罗伯特·基欧汉、[美] 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 10 ~ 16 页。

其历史制度根源可追溯至黎巴嫩战争终止和战后重建初期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地区域外大国和黎国内精英所达成的利益妥协和制度安排。

首先，美国、沙特和叙利亚主导下的黎国内安全保障和政治重建进程，为黎国内外利益相关方实现经济分肥奠定了制度基础。黎巴嫩内战的终止和《塔伊夫协议》的签订执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1989~1992年美国、沙特、叙利亚三国在解决黎巴嫩冲突方面的迫切需求和利益妥协。美、沙两国为换取叙利亚在海湾战争、阿以和谈等问题上的配合与支持，最终默认了叙利亚在黎巴嫩的主导地位。作为配合美、沙地缘战略需求的回报之一，叙利亚则通过制度操控、教派制衡及其在黎国内的盟友体系和军事情报机构，长期把持着黎战后政治进程。在政治重建方面，以《塔伊夫协议》为基础的黎战后政治秩序，同样是大国利益布局与内战前后黎国内全新的政治现实相互协调的产物。黎政体从总统制向内阁制的转变以及议会权力的提升，意味着逊尼派总理和什叶派议长成为协议最大的受益者。内战期间崛起的各教派军阀、民兵政党则完全取代了传统教派领袖家族，在黎战后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长期出任总理的拉菲克·哈里里（Rafic Hariri）是黎内战和海湾石油经济繁荣时期兴起的黎巴嫩“海湾承包商”资本集团的最重要代表人物，至少自1984年起就成为沙特和西方在黎利益的首要代言人。叙利亚则一方面通过总统、议长来钳制总理，另一方面通过其在教派政党中的盟友体系来削弱亲沙、亲西方资本集团的影响力。纵向来看，前民兵领袖—教派政党、新兴资本集团都努力延续或塑造自身为政府与民众之间利益的中介人，分别依托其权力地位和资本厚度成为维持自身庇护网络的主要资源。1992年重新确立的教派比例选举制度，则成为教派民众与政治精英进行利益交换的主要平台。

其次，战后权力结构的重组以及内战遗留的社会经济遗产，决定了新兴资本集团与教派精英共同主导着黎战后经济秩序，分配型政府对前者构成钳制，拉菲克·哈里里在两集团的经济分肥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内战期间，哈里里就凭借其特殊身份和资本实力与叙核心权力人物、黎教派民兵领袖建立起密切的利益联系。“内战经济学”则严重扭曲了黎国内就业结构和社会服务模式。参加民兵组织成为失业人口以及无家可归者解决生计问题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各民兵组织的军事、行政部门吸收了其控制区内近

1/3 的男性劳动力，为战斗人员及其家庭提供着最基本的社会服务。^① 为缓解内战暴力对民众生计的冲击、维持政府机构的运转，黎政府也扩大了基本消费品的补贴范围及公共部门雇佣的规模。1989 ~ 1992 年，以哈里里为主要中介，叙政府、黎国内教派寡头就战后经济分肥基本达成默契。叙政府受益于对黎出口、劳工输出，叙政府高层、驻黎军事情报人员获得广泛利益或灰色收入。前民兵领袖和黎军事安全机构则享有一定的预算份额，且分享哈里里主导下重建项目产生的租金。^② 作为交换，哈里里则彻底取代了内战之前和期间兴起的竞争性资本网络，掌控了黎战后重建和经济稳定方案的主导权，塑造了黎战后以金融、房地产和旅游业为引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同时，基于内战社会经济遗产和纵向利益涓滴的考量，战争终止阶段黎政府收编了 6000 多名前民兵战斗人员和军官，重组并继续扩大公共部门。^③ 教派政党则在很大程度上“俘获”了庞大的公共部门，以公共部门、私营企业就业机会以及基本社会服务为资源，换取并维持庇护网络内民众在国内政治特别是选举中对其的支持。

最后，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石油美元的注入和经济担保，既为上述制度框架的运转以及黎战后经济增长模式的启动和维系提供了最重要的燃料和润滑剂，也对黎政治精英构成潜在钳制。沙特等海湾国家在黎、叙两国进行经济投入，并在特定语境下将之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做法，同样可追溯至黎内战时期。长期以来，沙特在黎巴嫩的影响力主要依靠逊尼派传统领袖家族和巴解组织阿拉法特派系两大支柱，以外交斡旋和资金收买为主要政策工具。内战期间，黎逊尼派传统领袖家族影响力遭到极大削弱，1982 年后巴解组织主体被驱逐出黎巴嫩，沙特越来越倚重经济杠杆（官方发展援助、直接投资、侨汇、宗教慈善网络等）维持对黎政府影响

① Elizabeth Picar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ivil War in Lebanon," in Steven Heydemann, ed., *War,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306.

② Flynt Leverett, *Inheriting Syria: Bashar's Trial by Fire*,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p. 252, note 90, p. 253, notes 93, 94; Hannes Baumann, *Citizen Hariri: Lebanon's Neoliberal Reconstruction*, pp. 81 - 85.

③ Anne Marie Baylouny, *Privatizing Welfare in the Middle East: Kin Mutual Aid Associations in Jordan and Lebanon*,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62; Elizabeth Picard, *The Demobilization of the Lebanese Militias*, Oxford: Centre for Lebanese Studies, 1999, pp. 7 - 8.

力，调解沙、叙两国在黎利益分歧。对黎巴嫩而言，1980年海湾国家黎侨民占黎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为34.6%，侨汇收入（包括工资、储蓄、利息等）高达22.54亿美元，占黎国民总收入的35.4%，对维持内战期间黎国内经济运转而言至关重要。^①沙特政府通过对“哈里里基金会”的支持，间接扶持着一个规模可观的亲沙特庇护网络。1985年初黎镑暴跌，沙特政府就通过哈里里向杰马耶勒政府提出附带政治条件的紧急金融援助方案。^②在处理对叙利亚关系方面，沙特政府同样主要依靠提供或威胁撤销各种形式的经济援助来获得前者在阿以冲突、黎巴嫩内战、两伊战争等问题上的支持或配合。《塔伊夫协议》的签订和叙利亚在黎主导地位的确立，正是上述政治、经济交易相挂钩的幕后操纵之典型案例。据称谈判期间，为赢得叙政府对协议草案的支持，沙特政府向后者提供了高额援助。海湾战争期间，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又向叙政府提供了10亿~2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③

可见，黎内战的终止和战后经济增长模式的确立，是内战中的政治军事主导方与经济强势集团在特定历史节点协调利益和妥协的结果。其中，政治、安全领域由叙利亚主导，叙在与美、沙的协调下有条件地配合后者及其黎国内的盟友；经济领域由沙特和海湾资本主导，叙利亚及其黎国内盟友分沾利益。地区和域外大国间政治协调以及海湾和西方资本的持续流入，构成了黎战后经济增长模式的两大外部支柱。在黎国内，商业金融精英追求私有化、垄断和小政府，教派政党领袖则寻求借助大政府实现经济分肥以支撑其形成于内战时期的庇护网络。两集团在寻租逻辑本质上的冲突决定了黎战后经济增长模式具有一系列内在制度缺陷，两大支柱则决定了黎巴嫩对地区大国外部依赖的非对称性和脆弱性。

二 黎巴嫩战后经济增长模式的制度缺陷、 准危机表现和维系机制

在经历内战结束初期（1992~1997年）短暂的重建繁荣后，黎巴嫩经

① Salim Nasr, "Lebanon's War: Is the End in Sight?" *Middle East Report*, No. 162, 1990, p. 5.

② Hannes Baumann, *Citizen Hariri: Lebanon's Neoliberal Reconstruction*, pp. 44, 46, 52.

③ Sonoko Sunayama, *Syria and Saudi Arabia: Collaboration and Conflicts in the Oil Era*, London, New York: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7, pp. 212-213, 219.

济就开始频繁呈现周期性震荡，并多次陷入准危机状态。这一波动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可直接归因于黎战后经济增长模式诸多的内在制度缺陷。基于该模式两大支柱的多重保护性机制，又有效避免了黎经济陷入全面危机。

(一) 黎巴嫩战后经济增长模式的制度缺陷及其准危机表现

“双重钳制”下的自由放任经济模式首要也是最明显的制度缺陷是其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具体表现为黎战后经济中金融、房地产、旅游业等龙头产业易受海湾国家经济波动（包括油价波动）以及地区和黎国内安全和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海湾富油国收入每增加 1%，黎旅游业和商品出口收入就增加约 4400 万美元（相当于黎 GDP 的 1%），侨汇收入也会增加约 4000 万美元；在真实油价上涨 10% 的情况下，两年至三年后黎 GDP 将增长 0.8% ~ 1.2%。^① 经济增长模式的特殊性，决定了油价和海湾国家经济波动是影响黎战后经济走势恒在的重要因素。但事实上，除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前期的小幅波动外，1998 ~ 2008 年海湾经济随油价上涨一直呈现强劲增长势头，在 1992 ~ 2003 年，地区和黎国内的政治安全形势也一直相对稳定。因此，内战后最初 20 年黎经济的震荡和准危机，更多是黎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其他内在的制度缺陷作用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

第一，黎国内和海湾金融资本在黎战后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在黎巴嫩—海湾人员和资本流动以及黎战后重建的特殊背景下，黎金融资本集团与教派政党领袖达成利益共谋，通过对内举债拉动资本内流来实现自肥，结果导致黎政府的财政、债务压力不断增大。面对黎镑严重贬值、通货膨胀率高企的局面，1992 年首次出任黎巴嫩总理的哈里里采取了稳定汇率、对内举债两大政策。一方面，哈里里政府为黎镑和美元可兑换性担保，并在 1997 年黎镑价格稳定后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提升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另一方面，黎中央银行则通过出售高利率的以黎镑计价的国库券来平衡重建进程中的财政需求。黎国内商业银行是其主要购买者，同时又以稍低的高利率来吸引黎国内外储户储蓄，从利差中赚取暴利。最终，黎

^① Annette Kyobe and Azim Sadikov, “The Price of Oil and the Lebanese Economy: A Blessing in Disguise?”, Lebanon Selected Issues, IMF Country Report No. 12/40, February, 2012, pp. 17 - 18.

海湾侨民社团、教派政治精英、黎国内和海湾金融资本集团成为商业银行储蓄、央行高利率借贷的最大受益者。2002年，黎国内仅0.6%的银行账户持有着存款总量的40%以上，其中最重要的存款人——前民兵领袖、海湾地区侨民以及有政治背景的海湾、叙利亚投资者——成为商业银行高利率借贷的主要受益者。^①另有研究显示，2013年黎国内20家主要商业银行中18家的主要股东与政治精英有联系，有政治背景的个人控制着黎银行业总资产的43%，种种间接证据显示银行与政治精英在国库券利率的划定上存在共谋行为。^②同时，与海湾国家资本联系密切的商业银行——包括哈里里家族拥有股权的四家银行——占据了黎国内商业银行总资产的一半以上。^③应该承认，哈里里政府的上述政策短期内稳定了本国货币，在避免向外借贷的同时满足了重建时期黎政府的资本需求。但在本质上，对内举债政策实际是黎金融资本集团掌权后寻求自肥的最重要手段，加速了财富从普通纳税人向权力—资本精英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国库券的高利率致使黎政府债务爆炸式增长，公共债务占黎GDP比重由1993年的50.7%猛增至1998年的109.1%，1993~2002年黎政府用于偿还债务的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38%。国内商业银行则成为黎政府的主要债权人，1993~1998年黎政府所欠黎镑计价债务中2/3~3/4被国内商业银行持有。^④2000~2001年，沉重的偿债负担、长期的经常性赤字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终于在黎巴嫩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国库券、欧洲债券滞销，国内储蓄再现“美元化”趋势，黎镑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

第二，作为金融资本主导经济的结果之一，黎私营部门中小企业受到大资本的严重挤压，导致产业失衡现象明显，不平等、失业问题严重。首先，超高利率和较高的汇率削弱了黎巴嫩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商业银行大量购入高利率的国库券则意味着中小企业越来越难以获得商业贷款，限制

① Hannes Baumann, *Citizen Hariri: Lebanon's Neoliberal Reconstruction*, pp. 75, 80–81.

② Jad Chaaban, "I've Got the Power: Mapping Connections between Lebanon's Banking Sector and the Ruling Class," Ishac Diwan, Adeel Malik and Izak Atiyas, eds., *Crony Capit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Business and Politics from Liberalization to the Arab Spr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334–335.

③ Adam Hanieh, *Money, Markets, and Monarchies: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④ Hannes Baumann, *Citizen Hariri: Lebanon's Neoliberal Reconstruction*, p. 75.

了私营部门尤其是工农业部门的活力。1998 年底,不足 1% 的贷款人获得了银行贷款总量的近 50%,其中绝大多数都流向了大型工程,而非中小企业;贸易和服务业占全部贷款的 44.8%,建筑业占 21.9%,农业和工业分别仅占 1.5% 和 12.6%;1993~2003 年黎工业年均增长率为 -0.4%,制造业年均增长率则为 -1.8%。^①

其次,战后黎政府一方面推行明显偏向于供给侧的税收改革,另一方面则继续通过相关立法维持大资本集团在金融、商业部门的垄断地位。1993 年以来,黎政府不断降低直接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税率,新设增值税或提高非直接税(国内货物税、通信部门税收、行政费用等)税率。以基督徒为主的商业资本集团继续把持着对进口市场的垄断。2004 年黎国内约 1000 名进口商控制着全国约 90% 的进口贸易;约 200 家公司垄断了约 3000 份外国企业在黎独家营销许可证,进口商品涵盖了食品、药品、石化产品、建筑材料等关系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战略性物资。^②相关政策在刺激国内外投资方面收效甚微,却相对加重了中、低收入家庭的经济负担。

最后,1992~2010 年黎人均 GDP 增长了 47.2%,但产业结构失衡、垄断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2013 年黎成年人口的 0.3% 控制着至少 48% 的私人财富,其余 99.7% 的人口分享着剩余 52% 的财富,2007~2015 年贫困或被剥夺(根据家庭收支或生活水平测算)人口占黎总人口的 20%~27%。^③服务业(金融服务、房地产、批发零售贸易)和公共行政部门创造新就业机会的能力有限,进一步加剧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失业问题。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供水、供电、垃圾回收)等方面面临沉重负担。^④

① Hannes Baumann, *Citizen Hariri: Lebanon's Neoliberal Reconstruction*, p. 95; Ghassan Dibe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war Reconstruction in Lebanon," UNU-WIDER Research Paper No. 2005/44, July 2005, p. 17.

② Hannes Baumann, *Citizen Hariri: Lebanon's Neoliberal Reconstruction*, pp. 97-98; Fawwaz Traboulsi, *Social Classe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ebanon*, Heinrich Böll Stiftung-Middle East Office, 2014, pp. 37-41.

③ Fawwaz Traboulsi, *Social Classe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ebanon*, Heinrich Böll Stiftung-Middle East Office, 2014, p. 35.

④ Hannes Baumann, "The Causes, Nature, and Effect of the Current Crisis of Lebanese Capitalism,"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25, No. 1, 2019, pp. 67-70.

第三，教派政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公共部门，导致公共部门臃肿、低效、腐败丛生。这一制度的弊端一方面是内战中崛起的教派民兵政党维系其庇护网络、海湾承包商资本集团对其利益诉求做出妥协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战后经济环境下黎私营经济部门的疲软。具体表现为三点。其一，作为精英分享租金的核心机制之一，战后黎政府部门呈现“领地化”的趋势，控制不同政府部门的重要教派领袖、政党以不透明的方式分割了很大一部分政府预算。1992~2005年，总理哈里里主导的“发展与重建委员会”、德鲁兹派领袖瓦利德·琼布拉特（Walid Jumblatt）主导的难民部和“难民基金”共获得政府拨款86亿美元，1993~2004年议长纳比·贝里（Nabih Berri）控制下的“南方委员会”获得的政府拨款也高达8.5亿美元，上述款项的具体开支情况则被排除在政府预算之外。1998年总统主导下的军事安全部门开支占黎GDP比重高达6.5%，而教育、卫生、社会服务开支总和仅占7.8%。^①

其二，公共部门冗员庞大、招募缺乏透明度。很多部门在招募过程中出于扩张庇护网络的考虑，教派化、党派化、冗员化问题严重，公共部门雇员占劳动力比重不断上升，由2004年的12.5%升至2017年的25%。2006~2013年，公共部门工资、退休金、偿还债务、黎巴嫩电力公司（EDL）开支占黎政府支出比重平均高达81.6%，沉重的非生产性支出严重削弱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②

其三，电力、港口、垃圾处理等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部门管理混乱，腐败横行。盗电、拒缴电费、有意免费供电、进口燃料（主要来自叙利亚）造假等腐败行为使黎巴嫩电力公司运转低效且亏损严重，2010~2018年黎政府向黎巴嫩电力公司拨款合计超过140亿美元，年均拨款占黎GDP的3.8%和政府财政赤字的近50%，但2018年该公司仅能满足黎全国用电需求的63%，不同地区每日停电时长为3~12小时。^③ 内战结束以来，贝鲁特

① Bassel F. Salloukh et al., *The Politics of Sectarianism in Postwar Lebanon*, London: Pluto Press, 2015, pp. 45–46; Hannes Baumann, *Citizen Hariri: Lebanon's Neoliberal Reconstruction*, p. 82.

② Bassel F. Salloukh, “Taif and the Lebanese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Very Sectarian Public Sector,”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25, No. 1, 2019, pp. 46–51.

③ Ali Ahmad, Neil McCulloch, Muzna al-Masri and Marc Ayoub, *From Dysfunctional to Functional Corruption: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Lebanon's Electricity Sector*, Anti-Corruption Evidence Working Paper 30, December 2020, pp. 7–11.

港管理机构在权限、监管、审计、财务透明度等方面始终处于模糊状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关于贝鲁特港的腐败丑闻便层出不穷。围绕贝鲁特垃圾处理承包合同竞标程序、成本透明度的争议，同样伴随哈里里政府的倒台和东山再起而反复出现。^① 2015 年“垃圾危机”和 2020 年贝鲁特港大爆炸事件，都可视为黎公共部门乱象的极端体现。

第四，教派分权政体的重建及其分肥政治的本质，决定黎巴嫩政治进程容易陷入死结，进而影响国内经济活动。政治重建进程中黎国内亲叙、亲沙乃至亲叙派精英内部矛盾重重，基于海湾市场的金融资本集团与从内战中脱颖而出的教派政党集团在寻租逻辑上差异明显。诸多因素导致内战结束后最初 15 年，黎国内政治不时陷入紊乱状态。后内战时期黎巴嫩的 5 次议会选举和 2 次总统任期延长议题，无不在精英和民众间引发巨大争议。此外，总统、总理、议长以及其他黎亲叙派精英围绕重大决策议题争斗激烈，不时导致决策过程瘫痪。在哈里里主导重建进程时期（1992 ~ 1998），总统要求扩大对决策机制的参与权，议长利用预算批准和立法权向总理、总统索取特定的让步，总统、议长和重要党派领袖都通过内阁中的代表向总理施压，总理则试图通过建立平行的执行机构来绕过行政机构的羁绊。2002 年国际和地区援助方许诺向深陷债务危机的黎政府提供援助，后者则需承诺进行系统性经济改革。但在哈里里和总统埃米尔·拉胡德围绕上述改革的拉锯战中，大多数措施无法付诸实践。^② 2005 年哈里里遇刺、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后，黎国内政治力量再次经历分化重组，形成了亲美、法、沙的“三·一四集团”与亲叙、亲伊朗的“三·八集团”对峙的局面。两大集团围绕调查哈里里遇刺案的“黎巴嫩特别法庭”以及真主党武装合法性两大议题展开激烈争夺。2006 年 7 月黎以战争对黎巴嫩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40 亿 ~ 70 亿美元；冲突后的政治僵局和 2007 年 11 月以来的总统空缺危机，则使得黎经济在短时期内陷入瘫痪。^③

① Reinoud Leenders, *Spoils of Truce: Corruption and State-Building in Postwar Leban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7 - 42, 55 - 57, 90 - 95, 188 - 195.

② Reinoud Leenders, *Spoils of Truce: Corruption and State-Building in Postwar Lebanon*, pp. 132 - 139.

③ 李海鹏：《中东多元社会中的政治与族群认同》，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第 214 ~ 218 页。

（二）维系战后黎巴嫩政治经济秩序的保护机制

尽管深受上述内在制度缺陷的困扰，并不时爆发短暂的政治、经济危机，黎巴嫩却能在战后前 20 年总体保持稳定状态。究其根由，除了这一时期地区经济、安全环境的整体利好局面外，多重保护机制起到了关键的缓冲作用。

第一，地区和域外大国尤其是沙、叙两国在黎巴嫩事务上的沟通与协调，避免了黎国内政治危机升级为零和博弈。海湾战争结束直至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前，地区力量平衡、推进阿以和谈、叙利亚—伊朗关系、领导人个人关系等，促使沙特对叙政府采取相对宽柔的合作立场，默许后者在黎的主导地位正是沙特对叙政策的一个重要侧面。其间，沙叙协调成为黎三大政治首脑以及各党派间利益分歧得以解决的关键动力，沙特则主要通过拉菲克·哈里里维持其在黎国内影响力。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尤其是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以来，叙利亚新领导层的地区政策、叙伊关系进一步强化、美法等域外大国的干预，致使沙叙两国关系趋于紧张，在外部盟友支持下黎国内反叙阵营与亲叙阵营对峙加剧。2005 年哈里里遇刺后，黎国内党派彻底分裂为以真主党为首的“三·八集团”和以“未来阵线”为首的“三·一四集团”两大对立集团，美、法支持后者对真主党、叙政府采取强硬立场。沙叙关系因哈里里遇刺事件降至冰点，但沙特支持“三·一四集团”、遏制真主党和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同时，又不愿让叙利亚陷入混乱或将之完全推入伊朗的怀抱。因此，在直接协调中断的情况下，沙特仍通过迪拜、卡塔尔等第三方与叙政府保持着间接沟通。^① 在 2008 ~ 2009 年地区、国际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又是沙特政府率先与叙政府达成和解，恢复了两国关于黎巴嫩问题的直接协调机制，推动“三·一四集团”领袖萨阿德·哈里里（Saad Hariri）与巴沙尔实现和解。尽管在 2011 年夏未彻底破裂，但在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前沙叙协调确是黎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却总能转危为安、各党派始终保持斗而不破的关键所在。

第二，教派政党根据社会中下层的社会服务和庇护网络，部分解决了

^① ‘Abd al-Ra’ ūf Sinnū, *Al-Su-ūdiyyah wa-Lubnān, al-Siyāṣah wa-al-Iqtisād, 1943 - 2011*, Vol. 1, *al-Alāqāt al-Siyāsiyyah*, Bayrūt: Dār al-Furāt, 2016, pp. 529, 578, 585.

黎国内公共服务薄弱、失业、不平等等问题。在战后黎政府社会福利开支最小化、政治动员教派党派化的制度背景下，黎教派精英和政党通过社会服务和庇护资源选取支持者的选票，又把政治分肥中的部分“红利”作为庇护资源回馈给其支持者。基于这一逻辑，黎各主要教派政党在战后都在不同程度上维持、重建、扩大战争期间业已存在的社会服务网络。“未来阵线”下属的“哈里里基金会”在 2007 年至少运营着 1 家公立医院、约 30 家诊所、5 所中小学和 1 所大学；真主党在 2008 年至少控制着 6 家医院、16 个诊所、2 个中小学教育系统和庞大的基建与社会服务网络；三大基督教党派则通过党内互助互惠项目或关系密切的第三方私营或宗教机构向其支持者提供医疗、教育服务。^① 不同政党的社会服务网络都覆盖了其所属教派中相当比重的人口，特别是中下收入群体。早在 1983~1996 年，“哈里里基金会”的大学生贷款项目已向约 3.2 万名青年学生提供贷款；1986~2007 年，该基金会面向缺乏医保的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援助项目共资助了超过 9.2 万个家庭、766241 名公民。据估计，仅贝鲁特真主党社会服务网络的直接受益者就可能高达 6 万~8 万人，2005 年前后就读于其教育网络的学生数量接近 3 万人，其贷款机构仅在 2013 年就发放贷款 11 万份。^② 除直接的社会服务之外，向支持者提供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就业机会也是不同教派政党“服务换选票和支持”的主要途径。阿迈勒运动、社会进步党等不同党派在特定公共部门招募中拥有巨大影响力，而 2003 年公共部门（不包括军队、安全机构）雇员占黎人口比重高达 4.4%；有政治背景的企业则通过裙带关系性质的招募来回馈特定政治家的支持，2010 年这类企业占黎正式部门雇员总数的约 20%。^③

第三，侨汇和亲族互助等经济自我保护机制，增强了相当一部分家庭

① Melani Cammett, *Compassionate Communalism: Welfare and Sectarianism in Lebanon*,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43–144, 152–154, 173–180.

② Hannes Baumann, *Citizen Hariri: Lebanon's Neoliberal Reconstruction*, p. 46; Melani Cammett, *Compassionate Communalism: Welfare and Sectarianism in Lebanon*, p. 141; Joseph Dah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ebanon's Party of God*, London: Pluto Press, 2016, pp. 97–98, 113.

③ Bassel F. Salloukh, “Taif and the Lebanese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Very Sectarian Public Sector,”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25, No. 1, 2019, p. 48; Ishac Diwan and Jamal Ibrahim Haidar, “Clientelism, Cronyism, and Job Creation in Lebanon,” in Ishac Diwan, Adeel Malik and Izak Atiyas, eds., *Crony Capitalism in the Middle East: Business and Politics from Liberalization to the Arab Spring*, pp. 127, 133.

的抗压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经济状况。黎巴嫩是中东地区具有悠久移民传统的国家，仅1992~2007年黎海外移民人口就达到约44.6万人。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拉伯海湾国家成为黎“回流式移民”的主要目的国，2008年黎财政部部长表示1/3的黎巴嫩劳动力在海湾国家工作。^① 侨民社群和侨汇收入长期在黎国内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1993~2002年，黎巴嫩是全球范围内侨汇占GDP比重第三高的国家，2003~2009年个人侨汇收入占黎GDP比重为21.4%~26.4%。^② 对黎宏观经济而言，富裕而规模庞大的海外侨民社群是黎商业银行存款的主要来源，侨民资本回流是黎宏观经济稳定的支柱之一。对普通家庭而言，亲属侨汇收入是支撑家庭私人消费的重要来源。1997年，黎巴嫩家庭收入中42%来自非工资收入，其中家族、亲属资金支持和捐赠占9%。对低收入家庭而言，包括侨汇在内的资金支持所占比重则可能远高于9%这一平均数字。^③ 亲族、同乡或社区互助组织是黎普通家庭实行经济自我保护的另一辅助性机制。此类组织数量庞大，约占黎国内全部非政府组织的40%，据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估计，覆盖了黎全国约2/3的人口。尽管预算有限，但其所提供的紧急救助、教育医疗资助、亲族内就业、葬礼支持等服务，有助于在亲族范围内部分消除社会保障体系缺失所造成的不安全感。^④

第四，除了外国直接投资、商品和服务进口等稳定的资本流入形式之外，海湾国家尤其是沙特长期的经济援助以及对黎国内财政和金融状况的“潜在担保”，决定性地避免了黎国内财政、债务、汇率风险爆发为全面危机。战后经济重建的需求以及以金融、房地产业为核心的食利经济本质决定了黎战后经济严重依赖外部资本流入，而来自海湾国家和西方相关国家与机构各种形式的援助成了其主要来源。1998~2010年，官方发展援助平

① Guita Hourani, "Bilateral Relations, Security and Migration: Lebanese Expatriates in the Gulf States," *The First Mediterranean Interdisciplinary Forum 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MIFS, 2014, p. 647, note 4; Rola el-Husseini, *Pax Syriana: Elite Politics in Postwar Lebanon*,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19-120.

② "Personal Remittances, Received (% of GDP) -Lebanon,"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X.TR.F.PWKR.DT.GD.ZS?locations=LB>.

③ Toufic K. Gasp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Lebanon, 1948-2002: The Limits of Laissez-faire*, Leiden, Boston: Brill, 2004, p. 96.

④ Anne Marie Baylouny, *Privatizing Welfare in the Middle East: Kin Mutual Aid Associations in Jordan and Lebanon*, pp. 104-111.

均占黎中央政府开支的 6.66%；其中 1992 ~ 2004 年，阿拉伯基金、沙特、科威特及两国政府基金占了黎重建国际援助总额的约 30%。^①

更重要的是，在 1996 年、2001 年和 2006 年黎经济面临真实崩盘风险的“准危机”时刻，正是相关地区和域外大国尤其是海湾国家出于政治考量所做出的经济干预，决定性地挽救了黎巴嫩经济。1992 ~ 1996 年，哈里里政府积极支持美国政府主导的叙以、黎以和谈，推动真主党和以色列政府就双边正式接触机制达成协议。1996 年黎国内出现黎镑贬值恐慌，在美国、沙特支持下，黎政府于同年 12 月在华盛顿召开“黎巴嫩之友”捐助国会议 (Friends of Lebanon Conference)，前后共获得 60 亿美元捐款和优惠贷款，沙特、科威特政府则分别在黎中央银行存款 6 亿美元、1 亿美元。2001 年黎巴嫩再次出现金融危机征兆。在美国政府针对真主党施压增大的背景下，哈里里政府转向法国和海湾国家寻求政治经济支持。在哈里里的请求下，2001 年阿拉伯国家再次向黎中央银行存款 10 亿美元；2002 年 4 月，沙特政府从黎央行购买了价值 10 亿美元的欧洲债券；在 2002 年 11 月举行的第二次巴黎捐助国会议 (Paris II) 上，黎政府共获得 18.52 亿美元和 5.1225 亿欧元优惠贷款和捐款，沙特、法国成为最大的资助国。^② 2006 年 7 月黎以战争标志着地区两大阵营围绕黎巴嫩争夺的一个高潮，也再次将黎巴嫩推向经济危机的边缘。战争结束伊始，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再次向黎央行注入 10 亿美元，以支持黎银行系统；2007 年 1 月举行的第三次巴黎捐助国会议 (Paris III) 上，以海湾国家为首的国际捐助国承诺向黎提供 76.13 亿美元的援助和优惠贷款。^③ 上述干预措施在短期内起到了支撑黎外

① “Net ODA Received (% of Central Government Expense) -Lebanon,”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DY.OA.ODAT.XP.ZS?end=2019&locations=LB&start=1990>; Ghassan Dibeh, “Foreign Aid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ostwar Lebanon,” UNU-WIDER, Research Paper No. 2007/37, p. 4.

② Ghassan Dibeh, “Foreign Aid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ostwar Lebanon,” UNU-WIDER, Research Paper No. 2007/37, pp. 6 - 7, 9; Hannes Baumann, *Citizen Hariri: Lebanon's Neoliberal Reconstruction*, pp. 138, 140.

③ Bessma Momani, “Shifting Gulf Arab Investments into the Mashreq: Underlying Political Economy Rationales?” in Matteo Legrenzi and Bessma Momani, eds., *Shifting Geo-Economic Power of the Gulf: Oil, Finance and Institutions*, Surrey: Ashgate, 2011, pp. 179 - 180; Ali Salman Saleh and Charles Harvie,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Donor Funding: A Case Study on Lebanon,” *Euromed Journal of Business*, Vol. 12, No. 1, 2017, p. 8.

汇市场、稳定物价、缓解债务危机的作用，长期来看却在黎国内商业银行、国内外投资者乃至普通民众中形成了一种“特定”地区和域外国家为黎政府、央行提供“潜在担保”的认知。

不难发现，上述保护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支撑黎战后经济模式的两大支柱的衍生物。大国协调和资本兜底的风险性自不待言，侨汇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海湾经济，教派政党特别是哈里里家族“未来阵线”的庇护网络也在不同程度上依赖海湾资本收益。可见，两大支柱不仅直接塑造了黎战后经济模式和生态，还通过特定机制产生的“涓滴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着该模式固有的制度缺陷。种种形式的非对称依赖也意味着一旦与海湾国家关系恶化黎巴嫩将付出高昂经济和政治代价，这种脆弱性在2011年中东变局后也暴露无遗。

三 增长模式的系统性崩塌与2019年经济危机的产生

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快速变化的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环境严重动摇了黎巴嫩经济增长模式的根基，导致维持黎战后脆弱稳定状态的保护机制逐渐失效，黎模式的内在制度缺陷空前凸显，在两大支柱完全崩塌的背景下最终黎爆发2019年全面经济危机。

（一）国内外政治、经济、安全环境恶化对黎经济的冲击

中东变局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巨变，彻底打破了地区大国在黎国内政治中的协调机制以及2008年《多哈协议》以来黎国内各党派间所达成的脆弱平衡，严重动摇了黎战后经济增长模式所依赖的内外政治根基。在地区政治层面，随着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美国、沙特、伊朗等地区 and 域外大国加大了在黎巴嫩的资源投入和干预力度。2013年12月，沙特宣布将向黎政府军提供30亿美元援助，以帮助黎政府镇压国内恐怖主义为名，试图提升在黎国内的军事影响力。然而，对黎国内局势影响最直接、冲击最大的还是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危机。叙利亚战争和难民危机不仅严重破坏了黎战后经济增长模式所依赖的国内外安全环境，而且大大加大了黎政治经济系统运行的负担。危机爆发后，随着叙利亚境内武装冲突的蔓延、黎国内教派关系的紧张、极端势力的渗透，黎国内安全局势迅速恶化。考虑到

黎以服务业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的特点，黎国内和邻国安全局势的恶化自然导致国内外投资者和消费者对黎市场信心降低，国内外消费和投资明显趋缓，政府税收减少。安全局势不稳导致黎旅游业蒙受重大损失，贸易线路受阻导致黎商品出口减少，致使黎政府收入进一步受损。叙利亚难民大量涌入，不仅增加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开支，导致黎政府财政赤字加大、对外债务规模重新扩大，还对黎国内本来就很脆弱的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资源和就业市场形成了严重的挤兑效应，短期内极大凸显了黎国内不平等、社会服务薄弱等痼疾。

在国内政治层面，面对地区政治安全环境的巨变、外部势力干预力度的加大以及叙利亚危机在黎外溢效应的显现，黎国内各党派力量政治立场迅速极化，政治角力再度升温，黎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脆弱国内环境完全破裂。2013 年 3 月，亲“三·八集团”的纳吉布·米卡提（Najib Mikati）在两大集团不同方面的压力下辞职，妥协候选人塔马姆·萨拉姆（Tamam Salam）被提名为总理，经过近 11 个月的努力才组建起“三·一四集团”、“三·八集团”和中间集团各占 1/3 席位的妥协内阁。在议会选举问题上，在叙利亚内战走势尚不明朗的背景下，各方难以就《选举法》条款达成妥协。真主党倾向于暂时冻结黎议会政治以专注于叙利亚内战，“未来阵线”担心迅速崛起的萨拉菲主义团体对其逊尼派的垄断地位构成挑战，基督教各党派则担心“自由国民阵线”利用其在叙利亚内战期间积累的民意而实现一家独大，结果 2013 年 5 月黎议会宣布将原定于 6 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推迟至 2014 年 11 月。^① 在总统选举问题上，鉴于真主党不接受“三·一四集团”支持的强硬反叙利亚派候选人萨米尔·贾加，而基督教各党派又否决了中间集团提名的妥协人选，现任总统米歇尔·苏莱曼（Michel Sleiman）离任前，黎 5 次举行议会选举总统全部以失败告终，2014 年 5 月 24 日起黎进入总统空缺状态。^② 鉴于 2014 ~ 2015 年叙利亚战场局势的剧烈波动，黎

① Abbas Assi and James Worrall, “Stable Instability: The Syrian Conflict and the Postponement of the 2013 Lebanes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6, No. 10, 2015, pp. 1956 – 1958.

② Tamirace Fakhoury, “Lebanon’s Consociational Politics in the Post-2011 Middle East,” in Maximilian Felsch and Martin Wählich, eds., *Lebanon and the Arab Uprisings: In the Eye of the Hurrican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 25 – 27.

各党派的观望和“赢者通吃”心态决定了黎国内政治危机的延续。2014年12月，黎议会高票通过将议会选举日期再次推迟至2017年，而2015~2016年初总统选举也因出席议员不足法定人数而一再被推迟。议会选举推迟、总统空缺、看守内阁主政的局面，标志着黎宪政框架内的政治进程彻底陷入瘫痪，这也使得黎行政和立法部门长期处于停摆状态。2011~2015年，黎议会几乎没有通过任何有实质性意义的立法，政府预算完全未受到议会或审计部门的监督，大量高级行政职位长期空缺。^① 面对地区动荡、油价下行、叙利亚战争外溢效应等迫在眉睫的挑战，国内政治死结无疑使得黎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治理困境雪上加霜。

在地区经济环境方面，考虑到黎巴嫩经济对海湾资本的持续流入的强烈依赖，这一时期海湾国家的经济走势对黎经济增长同样不利。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海合会国家遭受油价剧烈波动、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地缘政治经济负担加重等的冲击，经济形势面临空前挑战。2011~2015年沙特GDP年均增速为5.17%，2016~2019年降至仅0.92%，同时段阿联酋GDP年均增速也由5.17%降至2.08%。2014~2019年沙特连续经历财政赤字，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迅速增大，2015~2016年经常账户呈现逆差。^② 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经济疲软，对黎巴嫩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在侨汇收入方面，据黎央行数据，黎巴嫩约60%的侨汇收入来自海合会国家，其中阿联酋、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四国一直处于最大的五个侨汇来源国之列。受所在国经济疲软影响，海湾国家劳工侨汇收入开始走低，如沙特外籍劳工侨汇收入2016年以来就呈现连年下滑的趋势。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黎侨汇收入相对水平的下降——2011~2019年侨汇平均占黎GDP比重仅为14.8%，远低于2003~2009年的23.7%。^③ 在商品和服务出口方面，

① World Bank, "Lebanon Economic Monitor: The Great Capture," Fall 2015, p. 30.

② "GDP Per Capita Growth (Annual %) -Saudi Arabia,"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KD.ZG?end=2020&start=2010>; "GDP Per Capita Growth (Annual %) -United Arab Emirates,"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end=2020&locations=AE&start=2010>.

③ Belen Sbrancia, "Oil-Price Spillovers in Lebanon: The Role of Remittances," Lebanon Selected Issues, IMF Country Report No. 14/238, November 29, 2016, pp. 54 - 55; "Personal Remittances, Received (% of GDP) -Lebanon,"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BX.TRF.PWKR.DT.GD.ZS?locations=LB>.

2014 年以来沙特等海湾国家对外贸易进口额明显下降, 相应黎对海湾国家出口在 2014~2017 年明显减少, 至少部分地导致了黎商品和服务出口在同一时期持续保持在低位。^①

(二) 经济关系政治化背景下既有保护机制的失效

在沙、叙在黎巴嫩协调破裂、沙—伊地区对抗升级的背景下, 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开始频繁诉诸双方之间非对称的经济依赖关系, 通过向黎政府施压试图遏制真主党在地区事务尤其是叙利亚战争中的影响力。首先, 针对对黎经济稳定至关重要的侨汇收入, 海湾国家多次以安全考虑为由威胁驱逐境内黎移民劳工。2011 年 3 月, 在真主党表态支持巴林反对派抗议活动之后, 海合会以及科威特、巴林政府纷纷声明将遣返境内的黎什叶派劳工。随着真主党介入叙利亚战争的深入, 黎侨民地位越来越成为海湾国家向黎政府施压的抓手。2013 年 2~6 月, 阿联酋等国多次威胁要驱逐境内黎巴嫩公民。同年 3 月, 海合会国家驻黎大使致信总统苏莱曼, 明确表达了对黎未能遵循对地区事务“不介入”承诺的“严重关切”, 并称“希望黎方以实际行动遵循相关政策, 以避免损害黎巴嫩自身的安全、稳定以及其人民的安全与利益”。^②

其次, 通过发布旅游警告, 威胁打击黎巴嫩旅游业、服务业。2013 年 3 月, 海合会书记处称海合会国家计划将前往黎巴嫩航班数减半; 5 月, 阿联酋、科威特政府以安全形势为由要求其公民避免前往黎巴嫩; 6 月, 海合会发布了针对黎巴嫩的旅行警告。考虑到这一系列举措恰好发生在黎真主党扮演了关键军事角色的古赛尔战役前后, 其中显然隐含着向黎政府施压甚至惩罚的意图。鉴于来自海湾国家的侨汇收入和游客消费对于黎国民经济以及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性, 海湾国家将黎移民劳工议题安全化、限

① Annette Kyobe and Azim Sadikov, “The Price of Oil and the Lebanese Economy: A Blessing in Disguise?” *Lebanon Selected Issues*, IMF Country Report No. 12/40, February, 2012, p. 18; “Imports from GCC to Lebanon-In thousands USD,” *Lebanese Customs Figures*, <https://www.economy.gov.lb/media/12275/gcc.pdf>; “Ex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Current US \$) -Lebanon,”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EXP.GNFS.CD?locations=LB>.

② Guita Hourani, “Bilateral Relations, Security and Migration: Lebanese Expatriates in the Gulf States,” *The First Mediterranean Interdisciplinary Forum 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MIFS, 2014, pp. 645-647.

制游客出行的做法，显然威胁到了黎国内经济的稳定和关键的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尽管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和很大的变化弹性，但上述举措却已直指黎经济依赖海湾资本流入的死穴，短期内无疑会影响到国内外投资者对黎巴嫩经济走势的判断和信心。

最后，通过哈里里在沙特的公司直接向后者施压，对黎国内教派庇护和社会服务网络造成间接冲击。作为哈里里家族资本网络中的旗舰企业，沙特·奥杰（Saudi Oger）公司曾长期依赖沙特政府的建筑承包合同。2014年年中特别是2017年6月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接任王储以来，沙特政府开始大幅度削减开支，沙特·奥杰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建筑业巨头之一。2015年起，公司开始出现财务危机迹象。2016年7月，一家沙特金融机构首次对该公司发起起诉，要求后者偿还贷款。沙特财政部则要求公司提供大量有关支出行为的文件，并委托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协助进行审计。^①结合同一时期沙黎两国政府关系恶化、沙特国内权力继承斗争的背景，很难说沙特政府的上述举措不包含任何政治意图。危机直接波及哈里里家族在黎国内的政治网络，在失去金融引擎后，“未来运动”被迫大力缩减其政党组织、媒体渠道，特别是医疗教育慈善网络的规模和开支。^②

（三）两大支柱的彻底崩塌和全面经济危机的爆发

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安全、经济环境以及海湾资本的政治“反噬”，维系了近20年的黎战后经济增长模式已然摇摇欲坠，该模式的诸多内在制度缺陷更是暴露无遗。2012年黎财政赤字为4.66亿美元，2014年已增至12.4亿美元。2006~2012年，黎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已由最高点的183.3%降至131%，但随后又重新开始增加，至2019年又增至174.5%。^③然而，2015年

① Matthew Dalton & Nicolas Parasie, "With Saudi Ties Fraying, Lebanese Premier's Construction Empire Crumbl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4, 2017.

② Tom Perry, "Cash Crunch at Saudi Firm Casts Shadow over Lebanon's Hariris," Reuters, September 6, 2016; David French, Tom Arnold, Katie Paul, "Exclusive: Saudi Oger Faces Huge Debt Restructuring as Rescue Talks Collapse," Reuters, September 8, 2016.

③ World Bank, *Lebanon: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of Assessment of the Syrian Conflict*, September 20, 2013, p. 62; "General Government Gross Debt (Percent of GDP): Lebanon," IMF,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GGXWDG_NGDP@WEO/LBN?zoom=LBN&highlight=LBN.

以来黎政府特别是哈里里家族又卷入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导致黎战后经济发展赖以维系的两大支柱彻底崩塌，最终将黎巴嫩推入全面经济危机的轨道。

在地区层面，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1 月，沙特基本完成了向萨勒曼父子的权力交接。沙特王室内部权力结构重新洗牌，哈里里在沙特国内最亲密的盟友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拉 (Abdulaziz bin Abdullah) 亲王等人迅速失势；^① 外交上小萨勒曼转向更强硬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政策，积极协调地区盟友对伊朗采取全面对抗。黎国内层面，随着叙利亚战场局势基本明朗、极端组织威胁上升、国内经济困难加剧，黎各党派精英获得突破政治僵局的契机；2011 年离开黎巴嫩后哈里里还面临着在国内政治中被边缘化、失去在其支持者中影响力的风险。在上述地区和国内背景下，沙特及其海湾盟友动用全部影响力向黎政府和哈里里施压，而后者在“选边站队”时的表现也直接导致了其与沙特新权力中心关系的破裂。因黎政府拒绝谴责 1 月 2 日发生的沙特驻伊朗使馆的袭击行为，2016 年 2 月 19 日沙特政府决定取消阿卜杜拉国王时期许诺给黎政府军和安全部队的 40 亿美元资金援助；2 月 23 日，沙特政府以安全为由再次发布针对黎巴嫩的旅行警告，并于 3 月 2 日宣布真主党为恐怖组织。为挽救自己在国内的政治生命，2016 年夏哈里里说服沙特政府支持米歇尔·奥恩 (Michel Aoun) 竞选黎总统，最终打破了长达两年多的总统空缺僵局。但奥恩在当选后却并未放弃其与真主党的盟友关系，真主党和伊朗成为最大赢家。^② 2017 年 11 月 3 日胡塞武装、萨利赫联军针对利雅得的导弹袭击事件后，11 月 4 日黎总理哈里里在利雅得通过视频宣布辞职，并指责伊朗和真主党在地区制造动荡。尽管哈里里在与沙特沟通后于 12 月 5 日撤销了辞呈，并在 12 月 21 日强调海合会国家不会对黎巴嫩实施制裁，但沙特新权力中心与哈里里间的相互信任已不复存在，前者在黎巴嫩与真主党和伊朗达成协调的环路彻底破裂。

① Neil Patrick, *Saudi Arabian Foreign Policy: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London, New York: I. B. Tauris, 2018, p. 220.

② Dilip Hiro, *Cold War in the Islamic World: Saudi Arabia, Iran and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335 - 336; Michael Young, "Home, Alone,"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January 7, 2020.

在上述多重因素多年的积累发酵下，黎政府与沙特及其海湾盟友关系的破裂，最终触发了战后黎经济秩序的全面崩溃。2016年撤销援助事件特别是2017年哈里里辞职事件后，面对国内外投资者对黎金融、旅游、房地产业信心动摇的风险，黎中央银行（Banque du Liban）明显加大了“金融工程”的力度。仅2016年，黎银行就以美元存款证（\$-CDs）的形式借款128亿美元，使央行外汇负债总额由425亿美元猛增至533亿美元。为规避货币挤兑和资本外逃的风险，黎央行又鼓励商业银行进一步提高长期存款利率，2017年10月至2018年6月黎镑和美元的加权平均存款利率分别上升了116个基点和37个基点。^①

尽管在短时间内维持了黎宏观经济的稳定，但黎央行的上述措施无异于饮鸩止渴，将黎政府推到了财政、债务、货币危机的边缘。在这一形势下，哈里里政府试图利用辞职事件再次说服“国际支持黎巴嫩小组”成员为摆脱黎经济困境举行国际投资方会议。在2018年4月举行的“通过改革和企业促进发展经济会议”（CEDRE）上，法国、欧盟、世界银行等捐助方共许诺为黎政府提供11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赠款。但不同于前三次捐助会议的是，这次会议的捐助方将黎政府具体的改革措施作为提供贷款的先决条件，而2018年5月议会选举后黎精英间的分肥斗争却使得黎各党派无法就改革议题达成共识。更重要的是，沙特、科威特虽参与会议、承诺贷款，但却缺乏实质性行动，类似前三次捐助会议中的海湾国家向黎央行存款、购买黎政府债券等“救市”举措始终没有出现。黎政治精英固化、短视的利益诉求以及海湾国家放弃为黎经济“兜底”的信号，使得CEDRE援助计划成为一纸空文，也将黎巴嫩彻底推入了全面经济危机的深渊。2018年9月起，黎国内商业银行私营部门存款额已开始减少，存款美元化趋势加剧；2019年前9个月已有约30亿美元资本流出黎巴嫩。^②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元短缺和货币贬值的恐惧迟早会爆发为货币—金融危机，2019年

① Toufic Gaspard, *Financial Crisis in Lebanon*, Beirut: Maison du Futur and Konrad Adenauer Stiftung, 2017, pp. 8 - 9; World Bank, "Lebanon Economic Monitor: De-Risking Lebanon," Fall 2018, p. 20.

② Sarmad Khan, "Lebanon Sees \$3bn in Capital Flight as Mena Flows Set to Rise," *The National News*, November 4, 2019.

10 月黎政府征收 WhatsApp 通话税的计划及其引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只是点燃这一已发酵多年的危机的偶然火花。

结 语

2019 年 10 月爆发并延续至今的黎巴嫩经济危机是一场综合性的债务、金融、经济危机，其制度性根源可追溯至 1990 年黎战争终止和战后重建进程中地区和黎国内利益攸关方所达成的制度安排和利益交易。基于特定历史背景下沙特、美国与叙利亚达成的政治协调，以哈里里家族为代表的新金融资本集团与内战中脱颖而出的教派民兵、政党精英实现脆弱合作和利益分沾，形成了国外资本输入和国内分配型政府“双重钳制”下的黎战后自由放任经济模式。大国政治协调和海湾资本注入构成了该模式的两大支柱。这一模式本身就决定了黎战后经济持续表现出高负债、不平等、公共部门低效腐败、对外部安全经济环境高度敏感等内在制度缺陷，其得以维系依靠的是不同形式的外部政治介入和资本流入所产生的利益横向分沾和纵向涓滴效应。2011 年中东变局后，沙叙协调破裂、沙伊竞争加剧，海湾资本流入呈现政治化趋势，加之影响黎经济的外部消极因素因地区动荡特别是叙利亚战争而凸显，黎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趋于崩溃。2016 年后沙特及其海湾盟友放弃对黎经济的“潜在担保”，黎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最终在偶然因素触发下于 2019 年底全面爆发。相对以往研究本文旨在表明，地区经济、安全环境是影响黎战后经济波动的恒在因素，但特殊的经济增长模式放大了其影响。该模式才是驱动特定制度缺陷在战后持续发酵的根本因素，其历史制度根源要追溯至战时遗产和战争终止的关键节点。当前黎经济危机的根源远远早于叙利亚战争的爆发，但叙利亚战争为危机的引爆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催化剂。在地缘政治博弈升级背景下海湾国家对黎巴嫩的战略性惩罚，构成了颠覆黎战后政治经济秩序的“拐点”，也成为触发黎经济危机的直接诱因。

自 2019 年 10 月经济危机全面爆发直至 2022 年 4 月媒体热炒“黎国家和央行破产论”，断崖式经济崩溃、政府应对方案分歧与地区地缘争夺之间的互动关联，进一步印证了本文所阐述黎战后经济模式的运作机制和致命缺陷。在多次更换总理但仍无望获得海湾政府资本救助的情况下，黎政府

于2020年4月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危机解决方案。但考虑到IMF方案必然损害教派精英与金融精英利益以及同期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借机打压真主党及其国内盟友的一系列措施，黎政府与IMF谈判启动伊始就陷入死结。政府的无作为与新冠疫情、贝鲁特港爆炸的经济效应相叠加，导致2021年夏起黎经济加速恶化，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燃料、药品短缺日益严重，供电、供水濒临崩溃。2021年10月，米卡提政府恢复了与IMF之间中止已超过一年的谈判。然而同期，随着拜登和莱希分别主政美国和伊朗、美伊重新就伊核协议恢复接触，地区反伊朗、真主党阵营在黎巴嫩的争夺却又开始升级。美国、以色列通过黎巴嫩特别法庭、针对性经济制裁、小规模军事打击等方式持续向真主党及其黎国内盟友施压，沙特、阿联酋也以进口和旅游禁令等方式进一步扼杀黎巴嫩经济，伊朗、真主党一方则通过提供燃油和街头暴力等措施对前者做出回应。黎政府则继续陷入分裂，危机应对也依旧乏力。尽管黎政府于2022年4月初与IMF就改革与援助方案达成初步协议，且在次月的议会选举中真主党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但债务分担所涉及的复杂利益争夺、组阁和总统选举极可能面临的艰难拉锯，以及俄乌冲突爆发后黎凡特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不确定性的加剧，都决定了该方案能否最终通过和落实尚属未知。

悠久的金融服务业传统、庞大的海外移民社群以及严格的教派分权体制，使黎巴嫩经济危机具有相当独特的国情背景。但本文的分析表明，黎巴嫩的案例在当前的中东地区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普遍意义。其一，战后经济重建是任何后冲突国家都必然面临的一大难题。对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国而言，无论其原有政体如何、社会构成怎样，在战争终止和战后重建阶段都不得不面临处理战时社会经济遗产、介入战争的外部势力之经济诉求乃至引发战争的重要经济诱因等复杂议题。黎经济危机的案例显示，针对上述议题的政策博弈和制度安排，可能对一国战后的经济发展轨迹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其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海湾金融的国际化以及中东国家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加速，阿拉伯贫油国对富油国的经济依赖空前加深，富油国出于特定政治诉求很容易将侨汇、援助、投资、贸易等经济纽带转变为外交工具。沙特在黎经济危机中的政策表现绝非孤立个案，富油国利用非对称经济依赖关系向贫油国施加政治压力的案例自1991年海

湾战争直至 2010 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后已多次上演。^① 考虑到“愿景时代”海湾富油国经济多元化、本土化的改革方向，无论是出于地区经济转型还是国家经济安全的考量，阿拉伯贫油国也将很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经济增长模式再定位的深刻挑战。

① Helene Thiollet, “Migration as Diplomacy: Labor Migrants, Refugees, and Arab Regional Politics in the Oil-Rich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Vol. 79, No. 1, 2011, p. 108; 张帆:《海湾君主国对中东国家对外援助动因的发展变化》,《西亚非洲》2016 年第 1 期。